

郭山主人文集

宋玮明·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鄒山主人文集

宋玮明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二〇〇六年八月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责任编辑：炜光

封面设计：淑玲

獅 山 主 人 文 集

宋 玮 明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湘潭市印刷厂印刷

•

200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40,000 印数：1-500

ISBN 962-450-401-6/D.50081

I. 229/定价：人民币 30.00 元

序

一日我在校园的樟树林下的晨练，恰遇宋玮明先生也在此散步。他邀我为其所著《狮山主人文集》作序，我想我非名人，亦非宋先生研究领域的行家，因而惶悚不安，再三推却。宋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加上勤读苦研，笔耕不辍，以致学有专攻，成绩斐然。如我辈不昧深浅，贸然作序，恐不但不能为之增辉，反可能为之减色，故一再拖延推诿。不期今晨又在园林下邂逅，便无法逃遁了。宋先生不以我辈人微言轻为虑，我亦只好勉强从命了。

我与宋先生同为长沙东乡人。他家在浏阳河上游的浏阳县葛家乡，我家在浏阳河下游的长沙县黎托乡。浏阳河是一条文化内涵丰厚的河，它虽没有奔腾万里的长江气势，也没有波涛澎湃的黄河壮丽，甚至比不上白舸争流的湘江繁华，但它静静地流淌着，日夜诉说着戊戌维新的历史沧桑和秋收起义的烽火岁月。“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可以说我们都是在同饮一江水中长大的，都受着同一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人生观和学术观。加上我们又都是湖南科技大学的“三朝元老”，共同经历了湘潭师专的艰难岁月、湘潭师院的蓬勃发展和湖南科大的辉煌崛起。近三十年的共同蹉跎岁月，使我对宋先生的为人，治学有着较多的了解。

宋先生生活朴实节俭，工作勤勉执着，教学刻苦认真，其效果自然是很不错的。他较早地晋升为教授，并任过政教系的系主任，主持着一个部门的工作，可惜过于坚守，执着而不灵活开放的性格，使他从政远不如从文。文如其人，他做学问刻苦深研，有着难能的坐冷板凳精神，所以成果累累，社会反应不错。我读过他撰写的或

主编的一些专著或论文，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简史》、《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论》、《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等，这些论著涉猎广泛，搜集了不少难以查寻的材料。这是只有涉深海者方能做到的。他对中外哲学颇有研究，有着哲学的功力，所以论述复杂的问题既有历史唯物的观点，又有辩证唯物的分析，且每每具有创新意识，能给人以启迪。这些都足以说明他为文、为学用功之深。他的论文、著作曾多次在省内外、校内外获奖，获得专业内人士的肯定和赞誉。

为学为文历来都是一条艰难、寂寞而清苦的道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更是如此。我辈无能，只能象老牛拉碾一样在读书做学问的“旧”轨道上转磨。然而，读书、研究和推敲、写作的那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那一份精神上的充实愉悦，却也是名利场中的权势和金钱替代不了的。这种心境，这种自慰大概是我辈之人所共有的，愿以此相互勉励。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康咏秋 2006年7月8日

(序作者原为湘潭师专校长、教授)

自序

我家祖居在浏阳县葛家乡元佳村，我家老屋后面有座祖坟山名叫狮子山，于是我便以“狮山主人”自称。我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我家的厢房门上曾挂着这样一幅对联：“花香不比书香远，嗜味无如道味长。”颇能反映我家主人的精神追求与家庭风貌。我小时候就曾听说过一些关于狮子山的故事：狮子山的对面是座象形山，山麓有座龙王庙，两山之间有条称为沅水的小溪潺潺流过，老人们常说这两座山是天生的“狮象保水口”，远远望去好像是耸立在元佳冲口两位守卫的门神。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着祖父在屋旁花园尝花，祖父为了考考孙子的口才，指着老屋后的狮子山给我父出了一联：“狮子山前无旷土”，要我父应对，我父想了想，立马便说：“龙王庙下有良田”，堪称绝对，当即受到祖父的夸奖。狮子山上埋葬有我家三代祖先的坟墓。1978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也遵照他的遗嘱，最终将骨灰埋葬在狮子山上，并在墓碑两侧自题刻了一幅对联：“狮山有幸埋亲骨，沅水长流佑后人。”可见我家祖祖辈辈与狮子山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966年，我在湖南师大政治系毕业后，首先在通道一中、浏阳师范工作了十来年，由于“文革”结束后，教育大发展形势的需要，我便于1979年调到湘潭师专工作，不久，师专升格为师院，后来又与其它院校合并，改为湖南科技大学。我在大专院校工作的二十多年中，服从组织的需要与安排，主要担负两个方面的教学任务：一方面是从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到毛泽东思想概论；另一方面是从教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到中国法制史。为了进一步

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与业务水平，我结合自己所担负以上两个方面的教学任务，开始了我的科研工作。在第一个方面，我编写了专著《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这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本系统研究革命政权建设的专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社科优秀图书奖。在第二方面，我编写了专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简史》，是一部以学术文化发展为主的专门史，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获湘潭市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与此同时，我在《求索》、《毛泽东思想论坛》、《船山学刊》、《中国文化月刊》和《团结报》等海内外报刊及各大大专院校学报上发表有关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学术论文共六十多篇。2004年退休后，我把这些文章翻出来，重新过目，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选择其中自己较为满意的文章40篇，汇编成《狮山主人文集》一书，馈赠学术界的同仁及自己的亲朋好友，作为自己在科研上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这个文集中，我将选编的40篇文章按照内容的不同分为三组：第一组共19篇文章，是关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关于党史、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还有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从选题与立论方面来看，我都很注意它的创新意识，尽量避免人云亦云，读后对人都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例如：，《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一文，是我为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撰写的一篇论文。文章除将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政策的转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政策发生转变的社会原因外，最后在总结时还特别提出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意识”才是政策转变的内因，而且是根本原因。在当时学术界的不少禁区还未完全打开的情况下，我的这种观点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我不但在大会发言时获得了理论界人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而且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华文摘》、《团结报》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都摘要刊登或全文复印了这篇

文章。第二组共 17 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哲学史、法制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中国古代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而且对我们党在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旧布新，古为今用方面所作的贡献也作了有益的探讨。由于自己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因此在这方面撰写的论文，不仅知识面广，而且思想分析也有相当的深度。例如：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几篇文章就较有代表性，其中《王夫之法制思想述评》一文，是我为王船山诞辰三百周年所作，在衡阳召开的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此文被大会肯定为“船山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至今仍保留在王船山的“湘西草堂”作为展品。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求索》摘要刊登后，台湾的《中国文化月刊》又作了全文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三组共 4 篇文章，主要是关于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既有自己对于高校教改，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改革的认识和体会，也有自己多年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经验总结等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特别注重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这从前面我的科研论文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个重点。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我组织主编了《湘湖历代爱国精英传论》一书，作为湖南大中学校结合乡土实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本教学参考书，其书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文字生动活泼，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说是一体可供雅俗共尝的好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所有这些文章，这次编辑出版，除了少数个别的文章在文字上有所增删外，大部分文章都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只不过其中有些文章的页注这次都改成了尾注。由于本人的思想、写作水平有限，尤其是在飞速前进变化时代所留下的笔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学校领导和

诸多亲友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原湘潭师专校长，康咏秋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湘潭市老年书法协会理事，好友周振其为之题写书名，内侄女黄淑玲无偿为本书作封面设计，老伴黄炎英女士带病为本书多次校稿，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宋 玮 明

2006 年秋于湖南科大雨湖校园

目 录

(一)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	(3)
共产主义必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20)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光辉典范·····	(31)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永放光芒·····	(46)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贡献·····	(56)
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	(69)
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政策的 转变·····	(78)
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策的两面性与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指导 方针·····	(89)
试论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	(98)
执政党建设的宝贵经验·····	(113)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的新发展·····	(125)
建国初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探析·····	(135)
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教训·····	(14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	(159)
邓小平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169)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78)
新时期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	(188)
学雷锋活动述评·····	(192)
杨昭植烈士传·····	(205)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不懈奋斗精神”	(223)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与中国传统文化	(231)
老子的“以弱胜强”和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	(242)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	(253)
儒家文化与中国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266)
儒商精神与二十一世纪	(275)
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浅析	(281)
略论周敦颐的爱国主义思想	(289)
论王夫之的治学方法	(297)
王夫之实学思想初探	(314)
王夫之法律思想述评	(325)
谭嗣同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44)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355)
王船山、谭嗣同与陆王心学	(363)
湖湘文化中的优秀爱国主义传统	(374)
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华	(387)
《说文解字》与许慎思想浅析	(396)

(三)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405)
谈谈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	(411)
爱国主义教育方法浅探	(417)
论新形势下增强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422)

(一)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个“在比较更完全意义上开始了”^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湖南不但和贵州等省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发生了矛盾和斗争，而且这种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最激烈、最尖锐。武昌首义后，湖南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新军及会党群众，立即发动武装起义，赶跑了清朝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杀死了企图顽抗的镇统黄忠浩，夺取了政权。而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却利用革命派的某些弱点，发动流血政变，杀害革命领导者，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这一惊心动魄的惨剧，是辛亥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之，考察辛亥革命运动中湖南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的发生、发展过程，揭示这一斗争的特点，将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的本质，总结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的生产力与腐朽的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逐步深入，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湖南自一八九九年英帝国主义威胁清政府开辟岳州为商埠开始，接着长沙、湘潭、常德相继开辟为商埠或寄港地。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湖南大量倾销商品，仅一九〇三年进口洋纱就达一万一千担，使“本地所产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②大大加速了湖南原有经济的瓦解，另一方面，大量掠夺湖南的工业原料，仅一九〇三年一年，湖南矿地被帝国主义强买骗买的就达八千余契之多^③，矿砂的销路剧增，刺激了湖南的地主、官僚和商人纷纷投资开矿，促成了湖南以工矿业为主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既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也有纯属“商办”的。随着工矿业的初步发展，湖南社会力量也开始有了新的配备，产业工人队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了。在资产阶级内部，当时可以分为两大阶层：一是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是刚由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上层资本家。由于这两个阶层与封建势力的关系不同，所以在政治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一个是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派。前者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有较强的革命要求，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后者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只要求立宪政体，反对民主革命。因此，两派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斗争。

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一、从华兴会成立到保路运动。

这个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发生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是革命派由建立组织，通过会党联系群众，与农民建立了较松懈的联盟，到发动起义的过程；也是立宪派由充当清政府反革命的同盟军，到开始脱离清政府影响，准备附从革命的过程。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引起了湖南进步人士对改良方案的怀疑，开始主张经过革命来实现民主主义，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逐步集合在革命旗帜之下，形成了民主革命派。当时湖南的留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则是这一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〇三年夏，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受“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他与留日学生杨毓麟、陈天华、刘揆一等于次年二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决定策划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为了组织起义的武装力量，便在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湖南是以会党势力雄厚著称的省份，华兴会会员加入会党是当时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相结合的主要途径。黄兴亲自去湘潭茶园铺矿山，

与会党首领马福益接洽，计划在一九〇四年年底发动起义，不幸事机被泄，清统治者大肆搜扑华兴会会员及会党群众，马福益被杀害，黄兴、陈天华等辗转逃到日本。一九〇五年五月，黄兴与孙中山先生会晤，随即将华兴会与华中会及其它革命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

一九〇六年二月，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湘军，重整会党”④，蔡绍南到萍、浏、礼一带活动，遇到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的青年学生魏宗铨，在魏的帮助下，蔡绍南与会党首领龚春台会晤，并进而联络萍、浏、礼其它各派会党，创立六龙山洪江会，设总机关于萍、浏、礼交界的麻石。这个洪江会实际上成了同盟会会员领导和改造下的一个反清组织，数月间，势力蔓延于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礼陵各县，计议在旧历年底(1907年1、2月间)，清官封印时起义。后因洪江会会员活动不慎，走漏消息，萍、浏、礼三县防军联合突袭麻石，湖南巡防营二哨又开驻安源，形势万分危急。龚春台、蔡绍南等人被迫提前于十二月四日传檄各路起义。十日之内，各处大小头目数百人先后举兵，总数达三万人以上。浏阳洪福党姜守旦也纠众响应，但不受节制。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大为震惊，纷调湘、鄂、苏、赣四省大军五万人以上，四面围剿。起义军和清军奋战近月，交战二十余次，终因众寡不敌而失败。龚春台“潜往长沙，徐图恢复”⑤，蔡绍南、魏宗铨等革命群众万人以上被杀，刘道一在衡山被捕遭害。

一九〇八年七、八月间，革命正处于逆流期间，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焦达峰等人，认为“同盟会举趾舒缓”⑥，主张在同盟会外另组一有势力的团体，以挽回颓势，促进革命早日成功。于是，在一九〇八年八月，焦达峰、孙武、张百群、邓文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宗旨与同盟会大体相同，而行动比较激进的共进会。这年十二月，焦达峰经共进会推派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焦达峰生于会党最盛的浏阳，父亲是个“有田五百余亩”的“某乡团总”⑦。焦很早就背叛了他的地主家庭，往来于湖南湖北各地；与会党群众有密

切的联系。一九〇六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这次被共进会推派回湘后，他一面与长沙的同盟会员杨任等人在长沙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一面往萍、浏、礼一带联络会党余部。一九一〇年四月，焦在湖南东路收编敢死士千人，十月，又收编了西路的会党群众。根据同盟会总部负责人谭人凤通知，准备响应黄兴即将在广州发动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五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焦达峰，谭人凤等先后逃往汉口，与湖北的孙武、蒋翊武等集议，准备乘湖南铁路路权风潮的时机，在两湖地区发难，并相互约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⑧。六月，谭人凤、宋教仁等仿行同盟会南部分会办法，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七月底，焦达峰、杨任，邹永成等同志由中部同盟会派遣回湘，恢复湖南同盟会工作，设秘密机关十二处，负责联络各方面起义事宜。武昌起义前，焦达峰组织指挥的群众已达万人。陈作新联络新军，也卓著成效。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满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它为了从危机中挽救自己，不得不用预备立宪的幌子来抵制革命。一九〇五年八月，清庭派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八月，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派从此有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一九〇七年，湖南立宪派人成立了“宪政公会”，立宪活动便在湖南境内开展起来。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保护并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和抵制民主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成为清政府的同盟军。

一九〇九年，清政府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陆续设立咨议局，作为清政府的咨询机关。这年九月，湖南咨议局成立，议长谭延闿，是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其父谭钟麟，做过湖广总督，本人是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与湖南的矿业资本家有密切联系。咨议局是立宪派绅士对清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大本营。“一般宪政党分子认为清朝不久就将实行宪政，正是他们攫取政权的机会。所以由谭延闿、陈炳煊、罗杰等人领导组织许多类似政党，实际就是争